

王 振,齐顾波. 分歧与弥合:循环农业发展中的利益群体分析——基于四川东村的调查[J]. 江苏农业科学, 2016, 44(9): 13-17.
doi: 10. 15889/j. issn. 1002-1302. 2016. 09. 004

分歧与弥合:循环农业发展中的利益群体分析 ——基于四川东村的调查

王 振,齐顾波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北京 100193)

摘要:当前,中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深入推进,居民对于农产品的需求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和食品质量安全问题也促使农业生产方式部分转变,其中以循环农业为主要代表。作为主流农业生产之外的农业生产方式,循环农业的发展涉及到政府、农户(农业组织)以及消费者等群体,不同群体限于自身的角度对循环农业的发展有着不同的价值判断和选择。根据对四川省简阳市东村循环农业发展现状的调研,分析政府、农户(农业组织)以及消费者在循环农业发展过程中的利益取向与动因,探讨利益主体之间的分歧并提出弥合的路径。

关键词:循环农业;利益群体;分歧;弥合

中图分类号: F304.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2-1302(2016)09-0013-05

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政策施行以来,中国农业在经过 30 多年的发展之后,基本解决了国人的吃饭问题,但是当代中国的粮食安全压力依然存在,并随着耕地面积的下降、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改善和农村劳动人口的转移而不时牵动人们的神经。有限的耕地面积和不断增长的总人口之间呈现出的矛盾在短期内难以有效逆转,同时,转型期的

环境问题和食品安全问题对农产品的生产提出了更高的需求,消费者收入的差距又直接导致农产品消费群体的分化,一方面是低收入群体对主要农产品消费的刚性需求,另一方面是高收入群体对农产品安全的关注与小众消费群体的逐渐形成。在这样的背景下,当代中国农业的发展主流趋势注定是现代农业,即高投入、高产出和大众消费的农业,这也是在保障粮食自给压力下可能的唯一选项。相比之下,循环农业的发展发端于主流之外,成长于小众消费之间,就政府政策层面而言,循环农业的重要性已经体现在中央“一号文件”中,但是在基层政府层面尚未有整套的扶持体系。随着环境污染的加剧和食品安全问题的凸显,循环农业生产方式的多功能性优势得到重新认识,循环农业在维持农业生态系统可持续性方面的作用不容忽视。循环农业是把循环经济理念应用于农

收稿日期: 2015-08-06

基金项目: 国际行动援助(中国“中国循环农业政策研究”项目(编号: 201404811210585))。

作者简介: 王 振(1987—),男,山东日照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乡村治理、农村发展。E-mail: 081wangzhen@163.com。

通信作者: 齐顾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可持续发展与资源管理、国际发展合作。E-mail: qigupo@cau.edu.cn。

[25]曹建军. 秸秆还田机械化技术及推广应用前景(下)[J]. 中国农机化, 1998(4): 31-33.

[26]朱 良,兰心敏. 秸秆(根茬)粉碎还田机使用、维护与选购指南[M]. 北京: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0.

[27]贺文胜,仇志强,孟秀兰. 机械化秸秆整体翻埋还田的试验研究[J]. 农业机械学报, 2003, 34(5): 179-180.

[28]毕于运. 中国秸秆资源综合利用技术[M]. 北京: 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8.

[29]GB/T 24675.6—2009 保护性耕作机械秸秆粉碎还田机[S].

[30]JOHN DEERE. 谷物收获机械[EB/OL]. [2015-6-23]. http://www.deere.com.cn/zh_CN/products/equipment/grain_harvester/grain_harvester.page?

[31]河南豪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4J 系列秸秆粉碎还田机[EB/OL]. [2015-6-23]. http://www.hnhfjt.com/Products_xx.asp? S=000103&NewID=203d.

[32]福田雷沃重工. 玉米收获机 4YZ-4B[EB/OL]. [2015-6-23]. <http://am.lovol.com.cn/yumiji/cc044yz4b.htm>.

[33]辽宁新风农机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1MC 系列灭茬机[EB/OL].

[2015-6-23]. <http://lnxfnj.com/imgcontent.asp? pID=263>.

[34]王志远,刘伟光,韩北平,等. SGTN-490 型灭茬旋耕联合整地机的设计[J]. 农业机械, 2011(3): 96-97.

[35]庄月芹,杨爱军. 1JHG-180 秸秆粉碎还田旋耕机的试验研究[J]. 农机化研究, 2010, 32(8): 150-152.

[36]徐州市农机技术推广站. 秸秆粉碎还田旋耕机: 200820032637.9 [P]. 2008-02-21.

[37]LEMKEN. Rubin 系列缺口圆盘耙[EB/OL]. [2015-6-23]. <http://www.lemken.cn/Proinfo.aspx? id=136>.

[38]淮安市淮犁机械有限公司. 1BS 系列南方水田耙[EB/OL]. [2015-6-23]. http://www.chinahljx.com/cpzs_detail.asp?id=146.

[39]Kornecki T S, Price A J, Raper R L. Performance of different roller designs in terminating rye cover crop and reducing vibration[J]. Applied Engineering in Agriculture, 2006, 22(5): 663-641.

[40]王 华. 玉米整秆半覆盖机技术分析[J]. 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 2006, 16(8): 294-295.

业生产,在农业生产中减少资源、物质的投入量和废物的产出排放量,实现生态的良性循环和农业的可持续性发展的经济发展模式^[1]。循环农业生产方式从根本上讲仍具有农业生产的基本特征: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相互交织;农业的弱质性;农业生产的多功能性;农业生产的周期性。同时,循环农业相比现代农业,其人力投入更多,质量相对更高,产量相对较低,市场相对狭窄,发展相对缓慢。这就决定了循环农业发展涉及的利益群体行为更为复杂,农业循环经济主体由政府、农业企业或农户、消费者、社会独立的农业 R&D 机构组成^[2]。政府、农户(农业组织)和消费者之间的价值判断和选择更为多元化。在实践中,如何协调各个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弥合利益群体之间的分歧并共同作用于循环农业的健康发展成为紧迫的现实性问题。本研究根据对四川省简阳市东村的调研,运用访谈法收集一手资料,将循环农业发展中出现的利益群体(本研究所涉及的利益群体主要指由经济利益取向不同而形成的宽泛的群体划分)划分为政府、农户(农业组织)和消费者 3 个部分,同时兼顾分析当地循环农业发展过程中非政府组织(NGO)的行为。

1 调查地点的选择和循环农业发展概况

1.1 研究背景

本研究选取的研究背景是四川省简阳市东村,作为简阳市 5 个建立循环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村庄,东村发展循环农业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较好。

东村位于四川省简阳市沱江东岸,属东溪镇辖区,紧邻成渝铁路,距成都 65 km,距简阳城区 9 km。东村临近 114 乡级公路,可直接通往村中心,在村委会驻地附近呈“鸡爪形”通向村庄内部。东村为行政村,共有 9 个自然村(村民小组) 493 户村民 1 647 人。全村常住农户 430 户,劳动力 800 余人,其中约 90% 的青壮年常年外出务工,农业劳动力相对缺乏。东村人口老龄化严重,2013 年统计显示 60 岁以上的老年人 300 人,老龄化率 18.2%。东村地形以山地丘陵为主,土壤类型以沙质土为主,土质松软,多砂石,耕作方便。东村土地主要分为耕地和湖塘水面,其中耕地面积 132 hm²,人均耕地面积 0.08 hm²,灌溉水源主要来自雨水和地下水。由于东村地处亚热带地区,当地的光热资源丰富,常绿阔叶林树种繁多,分布广泛,村庄道路两侧多种植柑橘和其他绿化树种。东村沼气数量众多,几乎家家都有沼气池,修建沼气池的时间跨度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到 2013 年。近年来,由于外出务工人员增加,当地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以妇女和老人为主,因此,家畜养殖量相对增加,这样就形成了“畜禽—沼气—水稻”的初级循环系统。

2010 年 11 月,在四川省农业科学院和东溪镇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的帮助下,东村建立了循环农业生产的农业合作组织——四川双河新天地农业合作社(以下简称合作社),合作社成员与村两委成员 1 套人马 2 块牌子。截至 2013 年,合作社注册会员已由设立初的 73 户发展到 323 户。东村依托合作社发展循环农业,四川省农业科学院负责技术支持。与此同时,合作社与外部联系较为紧密,中国农业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相继在东村开展学术研究。合作社的发展吸引了简阳市政府和其他非政府组织的关注,得

到了资金和宣传方面的支持。2013 年 9 月,东村农民合作社被评为“省级示范农民合作组织”。

1.2 循环农业概况

东村新天地农业合作社以有机水稻和有机蔬菜生产为主,其中尤以有机水稻为最。东村有机水稻的种植主要依靠合作社社员,现在有机水稻生产面积近 20 hm²,具体生产模式为合作社社员种植有机水稻,合作社提供相应材料、技术、劳力支持(如提供水稻种子、薄膜、防蚊灯、打沼气水、种植和施肥技术)每个社员每年须上缴合作社 65 kg 水稻,有多余有机稻,可以卖给合作社(3 元/kg),若合作社再统一包装转卖到市场后能盈利,再根据收购量对社员进行同比返利。

不难看出,东村循环农业的发展依赖于合作社,它是当地循环农业发展的中枢,负责生产任务的安排、生产资料的发放、生产技术的落实和农产品的销售以及利润的分成。在调查中,笔者发现,由于当地人均耕地面积狭小且土壤相对贫瘠,水稻产量也较小,仅能满足农户自给消费需求稍多,而当地有机水稻的产量与普通水稻的产量相差不大,但是有机水稻的口感更好、安全性更高。因此,当地发展循环农业的动力更趋向于内生性,即农户由于自身消费的现实性需求带动了当地循环农业的发展。但是这种内生性的循环农业生产方式并不影响对当地农户作为理性经纪人的判断,在调查中,不少农户认为合作社应当促进有机水稻的销售以增加收入。

2 利益群体间的选择取向与分歧

2.1 政府取向与政策现实

在粮食安全压力尚未得到有效缓解的大环境下,政府对农业的发展趋向于现代农业,这是政府作为公共部门的核心任务之一。自上而下的行政压力和保障当地农产品供给的现实压力也影响着政府的农业发展思路。值得注意的是,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唯 GDP 论英雄的政绩观在当前转型发展中显示出强大的惯性作用,相比于现代农业,循环农业的发展对于当地农户增收和经济的带动作用相对较小,这也是政府考察两者政绩影响的重要因素。对省县级政府来说,无论从回报率角度考虑问题,还是从利害关系角度考虑问题,投入于城市和企业都比投入于农村和农民“划算”得多。同时,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地方政府日益成为区域社会经济利益的主体,可以在中央政府给定的制度框架范围内运用自身掌握的各种资源,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由此可见,地方政府已经具备了“理性经济人”的基本特征^[3]。同时,就政府管理角度而言,循环农业的发展面临着管理上的困难,相较于现代农业的规模化和标准化,循环农业产生的生态外部性价值难以量化,分散的农业生产方式难以有效监督生产过程的质量,监管成本较高。另外,作为小众消费品,循环农业的产品销售渠道更为狭窄,品牌树立更为困难,而资本对于利润的追求也使循环农业的影响难以与现代农业匹敌。这些因素都影响着政府对循环农业的态度。

在东村合作社的发展过程中,东溪镇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事业单位)提供了较大的支持,但是政府层面的支持相对较少,无论是政策上还是财政上,唯一的财政支持是简阳市向东村(合作社)提供 10 万元的资金用于改善村庄内部道路。除此之外,根据对合作社理事 LXJ 的访谈,即“市县政

比较认同东村的生态农业模式,农业部农技推广中心 CSJ 曾带领几十个专家来东村开会,市委书记、分管农业的副书记、副市长、农业局局长、粮食局局长陪同。简阳市政府 HSZ 曾到东村视察两三次,但未有实质性的支持。”

合作社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政策支持,尤其是在产权界定、资金扶持、品牌建设和产品认证方面。但是东村循环农业发展的现实表明,即使在发展循环农业已经写入“中央一号文件”并有相关宏观政策出台的背景下,具体的政策落地仍存在较大困难。考察简阳市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只有5家合作社,而以循环农业生产为主的合作社更是少之又少。当地循环农业的发展几乎处于空白状态,社会影响力微乎其微,而处于起步阶段的循环农业发展更需要政府的支持。与此同时,政府的选择更趋向于见效快、影响大的现代农业而基本忽略了尚处于初期发展阶段的循环农业,相关的政策与资金支持几乎不存在。因此可以说,循环农业的发展与政府的政策取向呈现出死循环的状态,这也是当地循环农业发展亟待破解的死结。

2.2 徘徊的合作社(成员)发展思路

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农村发展的重要组织,其主要业务就是引导组织农民通过农业合作实现规模经营并以此增加市场谈判的筹码,降低农业生产的成本,包括信息成本和农业生产资料成本,从而保护农户利益,实现农民增收。农村专业合作组织作为政府、企业与农户之间的联结体,具有一定的“逐利性”,也正是这种“逐利性”才衍生出其对循环农业发展的示范和带动效应^[4]。可以说,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出现与发展是多个理性农户成立的理性经济人组织,其主要目的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企业一样,都是为了更好地参与市场竞争,降低农业生产的风险和成本,提高农产品的收益。

东村新天地农民合作社是当地循环农业发展的核心组织,负责有机水稻种植、具体技术指导和产品销售等。但是有别于其他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是新天地农民合作社参与者(不仅包括本村成员,其技术总监是东溪镇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YY)。调查发现,东溪镇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YY 为合作社的主要发起者和对外联系者,对合作社发展的影响甚至是决定性的,尤其在合作社发展思路的选择上更是如此。在合作社理事会成员看来,合作社的主要任务就是带领合作社成员实现增收,这是合作社号召力和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因此,当地循环农业的发展需要外部支持,尤其是政府的支持以及资金的投入,而且在部分程度上可以将现代化的农业机械引入循环农业种植过程中。同时,在市场销售方面,他们认为合作社应当加强市场营销,提升产品的市场知名度,扩展销售渠道。总之,提高合作社的收益是首先要关心的问题。这个发展思路代表了合作社成员的主流倾向,合作社盈利不足也成为目前亟需破解的困难。2013年,合作社全年营业额40余万元,几乎无利润,社员的分红自然没有。

值得注意的是,合作社理事会成员与东村两委成员身份高度契合,合作社的发展给当地村两委成员带来了意外的结果。在最近的村两委换届选举中,作为合作社理事长(党支部书记)的 LXJ 和副理事长(村主任) TYH 均高票当选,在他们看来,这是合作社发展给农户带来利益的结果,这种以合作社为依托的利益增加不仅表现在农产品销售方面,也表现在

以合作社的名义开展的妇女协会和老年协会建设,由于合作社与村两委成员的高度重叠,导致两者给村民带来的福利难以明确区分。因此,在合作社理事长 LXJ 看来,合作社不仅要通过发展循环农业生产优质农产品保障村民的健康,更重要的是要实现利润的可持续,这也是其领导地位和个人威信得以持续的必要条件,退一步讲,合作社的良好运营即使不会增加理事会成员的威信,但是运营不佳却会削弱理事会成员的影响力。从这个角度讲,合作社理事会成员对于循环农业的发展思路选择就出现了双动机,一方面是经济收益方面,扩大的市场有助于增加合作社收益,自己作为合作社成员也会得到分红;另一方面,作为村两委成员,合作社的良好发展带来的成绩能够使其借助随时转换的身份提升在村民中的威信和影响力,从而实现其在村庄政治上的持久影响。村支书、合作社负责人 LXJ 认为,现在没有项目进来,没有资金,合作社很难搞起来。要区分对待项目,不要一味拒绝。合作社首要任务在于致富,作为土生土长的村长,要是没有实质性地给农民腰包给鼓起来,搞合作社一旦失败,是很难堪的。

对合作社理事长 LXJ 而言,其特殊性还表现在其身份转换上,作为原化肥厂销售员回乡担任村支书和合作社理事长的他,放弃了相对优越的工作条件创办合作社,就其个人而言存在“证明自己选择正确”的问题。很显然的是合作社的发展现状未能达到他的预期目标。因此,这也是合作社理事会成员极力推动本村有机水稻扩展市场的原因之一。

农民所有经济行为的最终结果都会形成一个以自我为中心、以有效经济利益为半径的经济利益圆周^[5],具体到合作社成员,与理事会成员类似,普通社员中的骨干分子主要由村民小组组长构成,这也使他们的身份存在双重性,也意味着入社动机的双重性,即参与合作社发展不仅能够带来一定的经济收益,也能通过合作社保持对本小组内的影响力,从而维持自身的政治地位。当然,较之于合作社领导层,他们担负的领导合作社发展的任务相对较轻,其选择更倾向于与普通农户一样,借助合作社的发展销售循环农业生产的农产品实现增收,即经济方面的考量是这个群体关注的重点。受访者中有一位老婆婆(小组长),她觉得搞有机农业生产很好,但是问题是一来现在很多水稻卖不出去,二来很多农家肥因为自己老了运不上去(地势较高的耕地)。

与合作社理事会和普通成员思路不同的是担任合作社技术总监的 YY,也是东溪镇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负责人。在他看来,合作社的发展应当定位于农户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综合性农民组织。在访谈中,YY 对合作社的发展表现出极高的热情,更为关键的是他对合作社发展方向的掌控力无可替代,其双重身份也使其对上能够影响当地政府部门对合作社的支持,对下能够直接干预合作社的发展,对外则是合作社主要的联系人,众多的外部机构都是在他的协调下进入东村开展经验交流和学术研究。对这位技术总监而言,合作社的发展也是他个人成就的表现,尤其是他曾放弃了外出高薪就业的机会留在当地扶持合作社的发展,其理想化的合作社发展思路与农户现实性的增收要求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同时,他个人对于资本下乡和扩大循环农业农产品市场持谨慎态度。就主观因素而言,他的出发点是维护农户的利益,保护合作社成员不被市场和资本控制,但是目前合作社发展徘徊

不前却导致农户积极性受挫,长此以往将会直接影响合作社的发展。YY表示,目前不想进超市,虽然进超市价格和销量都会增加,但是提高价格所产生的利润获得者却是商家,普通老百姓得不到好处。价格升高,销量增大,农民提高生产规模,利益受到驱动,提高生产规模势必产生质量和风险等问题。合作社对比其他来说,发展是慢的,后期农民基本没有了积极性。应该去货币化,尽量减少对外在的依赖,希望从生态开始带来整个生活方式的改变。价格太高,经销商就抽走了,眼见为实的大销量就会让农民努力增加销量,会带来利益驱动使农民提高规模,也会涉及质量和风险等问题。

合作社内部之间的分歧主要体现在发展思路方面,理事会成员和普通社员之间在合作社需要更注重市场利益的考量上有着趋同的选择,这种倾向夹杂着复杂的个人主观因素和村庄政治因素。总之,借助合作社发展循环农业是一个平台,更是一种手段,最终目标还是要落实到村庄农户增收和村庄内部政治影响上。与此相对的是兼具合作社与政府身份的技术总监,其思路迥异于上述2个群体,更重视合作社对于丰富农民文化生活,激发农村活力方面,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对合作社的经济考量不关心。同时,无论是出于个人理想还是工作经验,资本的介入和农产品扩大市场在他看来都是风险极大的行为,这不仅包括一般意义上的市场风险,更包括资本对农户的经济控制可能会导致农户的利益受损,影响合作社的独立性和长远发展。

2.3 小众的消费群体

循环农业注重生产过程的循环性和农产品生产的安全性,这就意味着其质量和价格都比普通农产品高,循环农业的出现是农业生产与市场互动的经济结果,一方面当代农业与市场的紧密程度增强,市场信息能够及时传导到农产品生产上,并直接作用于生产方式的转变,在食品安全问题凸显的当下更是如此;另一方面则是农村农业生产有能力满足市场对高质量农产品消费的需求,即农业生产存在较大的质量提升空间,自然条件也能够支持高质量农产品的生产。可以说,循环农业的出现是市场需求引发的诱致性变迁。但是市场消费群体内部存在复杂的结构,收入的分化直接影响消费群体对农产品需求的不同,这也与马斯洛需求定理所阐述的逻辑解释基本一致。循环生产方式的农产品生产量较小,市场交易中主要消费群体是城市高收入群体,销售渠道狭窄而单一。值得注意的是,农产品市场的极大丰富一方面方便城市消费者的消费需求,另一方面也增加了消费者市场搜索的交易成本。循环农业发展初期,在农产品的品牌尚未树立、质量未得到认证的情况下,消费者只能通过超市等渠道购买主观认识的高质量农产品,而这正是小规模循环农业发展初期难以逾越的市场门槛。同时,较之于一线城市与省会城市,普通城市的循环生产方式的农产品市场容量更小,生产者也面临着市场搜索的问题,在市场定价时往往面临着定价摇摆的尴尬,一方面是过高于市场普通农产品的定价可能导致产品销售不佳,另一方面则是与普通农产品定价差别不大而影响销售额。

这种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以及循环生产方式的农产品的市场定位就人为地决定了循环生产方式的农产品必然是小众消费品。在双河新天地合作社产品的销售过程中,主要的农产品包括有机水稻和有机蔬菜,前者的销

售渠道单一而不稳定,主要通过熟人牵线进入市场,间歇性的市场需求也导致大米加工机械处于半闲置状态,加快机械的损耗;后者的销售则主要通过合作社成员采摘运输到附近的农贸市场,但是并未有显著的标志区别于普通蔬菜,售价与普通蔬菜一致,市场认可度也不高,基本处于“泯然众矣”的状态。在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的帮助下,合作社与成都消费者联盟合作,在水稻收获季节现场收割,直接到合作社采购,但是消费量不大。合作社售往省外的大米则主要是通过技术总监YY联系,这也进一步增强了其在合作社的话语权地位。

2.4 众多的非政府组织

循环农业发端于主流现代农业生产方式之外,对于政府的吸引力远没有设施农业和规模农业高,可以说循环农业是边缘力量在边缘农业生产开展的草根行动,虽然得到了政府宏观政策的指导,但是在具体层面上仍处于非主流状态。非政府组织对循环农业这一“新生事物”的出现有着天然的敏感性,它们的介入并不能够带来直接的支持,更多的是围绕循环农业的生产开展学术研究和一定的技术支持,同时借助现代媒体扩大宣传,提高循环农业的知名度。在双河新天地农业合作社,非政府组织可以成为循环农业发展的边缘利益群体,处于若即若离的状态,在当地开展活动的非政府组织也主要分为高校学术团体和社会公益组织,前者以北京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为代表,后者以香港社区伙伴和台湾慈济慈善基金会为代表。对于合作社的发展前景,非政府组织更多的是以旁观者的身份观察而不是干预,这也是这个群体的显著特征。但是,非政府组织的存在是当地循环农业发展可能利用的外部力量,也需要将其纳入相关利益群体的范畴进行考察。

3 弥合:循环农业发展需要凝聚共识

循环农业的发展有利于主流农业之外,面对市场对高品质农产品的需求,这是优势,而面对弱势的政策支持,这则是其明显的软肋。邓小平曾提出“农业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学”的重要论断,这也是对中国农业发展历史的经验总结^[6]。循环农业作为多元化农业生产方式之一,是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而发展的,这是其诱致性因素,但是这并不能使其摆脱对政策的天然依赖。循环农业生产和销售所依赖的基础群体是农户和农户组建的合作社等农业专业组织,这是理性小农对市场盈利预期和规避风险的现实选择,而合作社根植于农村、农民中间,其领导层的双重身份也必然推动合作社以经济利益为主要目的的价值取向,从而形成主客观因素的驱动合力。市场消费者是循环生产的农产品的终端,消费群体的多少和信息搜索成本的高低决定着农产品销售渠道顺畅与否,并直接影响循环农业生产主体的利益。

基于自身所处的社会角色不同,循环农业发展的相关利益群体所关注的重点也必然各异。以循环农业生产的主体(农户和合作社)为中枢的利益群体关系错综复杂,关注的焦点也呈现出分散的特点,在短时间内难以聚合。但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循环农业生产将是未来农业多元化生产的重要形式之一,而不仅局限于小众消费。同时,政府、农户(合作社)和消费者之间并不存在不可协调的矛盾,其中农户和消费者之间最容易达成共识,这是市场条件选择的结果,而与

农户(合作社)发展息息相关的政府则受制于政策的导向,但是政府政策的转变则是循环农业发展的要件之一。最后,非政府组织作为循环农业发展的外部借助力量可以在这个进程中发挥灵活的宣传推介作用。具体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政府政策应以开放的态度对待循环农业。通过政府干预的外在因素对于循环农业产业链网络的构建、产业链的整合、产业安全与管制等发挥指导作用,对于农业清洁技术的推广应用及“种-养-加”结合型优化模式的选择产生直接影响,是循环农业发展的外源动力^[7]。自上而下的农业政策导向是宏观环境下的产物,这也是国情使然。但是如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发轫之初一样,政策要以包容开放的态度对待新的农业生产方式,鼓励循环农业的发展和推广。市场是检验农产品的根本,作为循环农业发展的组织,合作社以市场主体的身份进入市场,不但能够促进循环农业的发展,更能够培育适应市场的新型职业农民,这也是循环农业作为中高端农业生产方式的社会效益所在。同时,在保护生态环境、建设美丽乡村的背景下,发展循环农业这一环境友好型农业生产方式本身就是呼应当代中国的现实政策导向,也是转变农业发展的应有之义。在基层政策层面,目前出台完整的循环年农业产业发展规划有一定难度,可行的措施是在农业部门下设专门的循环农业部门,纵向直接对接当地循环农业发展主体,横向对接循环农业发展需要支持的各政府部门、金融以及社会服务部门,从而围绕专门的机构打通各个行为主体之间的壁垒,形成合力。政府的主动作为对于循环农业的发展至关重要,可以借助建设美丽乡村的宏观环境推动循环农业发展,既能实现政府设定的任务,又能满足循环农业发展的政府扶持需要。

作为循环农业发展的核心组织和中枢机构,合作社的发展首先应当定位于独立的市场参与者而非半官方形态的农业组织,法人代表和社员构成限定在本村户籍农民之间,逐步剥离非合作社必要的职能划清合作社与村两委的职能边界并将合作社的活动透明化。合作社应培养具备技术传播能力的社员,逐步实现技术的消化吸收,同时将外部技术支持和年度计划机制化,避免混乱的技术管理引发社员的抵触情绪;规范非政府组织的支持,有选择地开展技术交流和宣传推介合作。针对消费者群体,合作社要以培育市场为主而不是与其他生产主体竞争市场,以此逐步扩大在消费者中的影响,尤其要注重生产和销售环节与消费者的互动交流,最大限度地降低消费者信息搜索成本。分散的消费者之间难以主动形成联合,这就需要合作社以及非政府组织能够主动发起消费者之间的联合,形成“组织对组织”而非“组织对个体”的成本优势。同时,合作社可以尝试将当地循环农业发展方式向周边村庄推广,储存技术、信息和增产潜力。

对合作社而言,最重要的是明确合作社的发展定位和思路,坚持市场导向。循环农业的发展与市场导向之间可以实

现良性互动发展,两者并非对立的关系,循环农业的出现和发展本身就是农业与市场紧密结合的产物^[8]。

4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以循环农业的特征及其与现代农业的基本区别为线索,结合实地调研的案例综合分析循环农业发展中政府、农户(合作社)和消费者的利益取向。笔者认为,作为公共机构的政府部门在考量管理成本时倾向于选择性管理,即更注重现代农业的发展,在考察粮食安全问题和农业效益的速度与数量时也更倾向于现代农业。但是,政府自上而下的政策模糊一方面为循环农业发展的制约因素,另一方面当前生态环境保护的政策导向也有利于循环农业得到政策的关注和支持。作为循环农业发展的基本依托组织,合作社成员构成上存在双(多)重身份性,这种双(多)重身份使合作社成员的价值判断和选择分化严重,尤其是掌握合作社发展主导权的成员之间的分歧使这一组织的发展徘徊不前。消费者作为循环生产方式农产品的终端,存在着交易成本过高的问题,难以有效获知产品信息。最后,本研究提出弥合各利益群体分歧的路径选择,重点在于政府和合作社本身,兼顾消费者和非政府组织群体。

循环农业的发展不同于主流的现代农业,其分散经营和集中面对市场的特征以及小规模生产、小众群体消费的特点都是影响其发展的因素。由于农业在产业发展过程中的话语权较小,各利益群体的分化难以依靠强有力的组织实现有效的弥合,这也是今后循环农业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问题。

参考文献:

- [1]林维柏. 循环农业刍议[J]. 农业经济, 2009(2): 5-7.
- [2]刘滨,康小兰,王珂. 农民行为逻辑与合作能力: 一个新的阐释视角[J]. 江西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9, 8(2): 30-34.
- [3]黄明元,邹冬生,李东晖. 农业循环经济主体行为博弈与协同优势分析——兼论政府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的制度设计[J]. 经济地理, 2011(2): 30-34.
- [4]陈诗波,郭敏. 基于循环经济发展的农合组织作用机理及制约因素分析[J]. 商业研究, 2011(6): 148-152.
- [5]陈东. 农村公共品供给意愿、利益群体与行为博弈[J]. 改革, 2008(6): 141-145.
- [6]张水生. 农业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学——学习邓小平关于农业发展的理论[J]. 武汉交通科技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8(2): 15-19.
- [7]周颖,尹昌斌,张继承. 循环农业产业链的运行规律及动力机制研究[J]. 生态经济, 2012(2): 36-40, 51.
- [8]王志刚,吕杰,郝凤明,等. 循环农业发展中企业与其利益相关者博弈分析[J]. 江苏农业科学, 2015, 43(3): 410-414.